

黄尚明
编著

中国考古学之父

李济传

黄尚明
编著

中国 考古学之父

李济传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传/黄尚明编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9. 6

ISBN 978-7-5680-5185-9

I. ①中… II. ①黄… III. ①李济(1896—1979)-传记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83241 号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传

黄尚明 编著

Zhongguo Kaoguxue Zhifu——Liji Zhan

策划编辑：韩 敏

责任编辑：韩 敏

封面设计：璞茜设计

责任校对：李 琴

责任监印：朱 珍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电话：(027)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430223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4

字 数：210 千字

版 次：2019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湖北科学家传记丛书”

编委会

主 编:湖北省科学技术史学会

顾 问:马 敏 刘松林

执行主编:王玉德 陈国祥 高杨帆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洪强 亢博剑 韦春和 刘立成 成良斌

李宏伟 李 强 李 斌 张 翼 张密生

张小健 胡 华 郭熙汉 赖玉芹 夏 劲

黄尚明 傅世金 韩 敏

编 序



中华大地，每个地方都不乏对文明有贡献的人物。湖北地灵人杰，历来涌现出许多杰出科学家。为了纪念他们，宏扬他们的事迹与精神；为了推进科学普及，促进科技强省与强国，近年来，湖北省科学技术史学会致力于对湖北科学家的研究。凡在湖北出生的，或在湖北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科学家，都作为研究对象。科学家的时间从古代到当下，包括医学、农学、地学、数学、工程技术等广泛的领域，如植物学家戴凯之，炼丹家葛洪，茶学家陆羽，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地质学家李四光，数学家许魁垣，化学家张子高、陈萌三，气象学家涂长望，名医王叔和、庞安时、李时珍、万全、刘若金、杨济泰等。这套丛书，力求有学术性、地方性、通俗性。近期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推出《李时珍传》等 10 部，将来还要连续不断地推出多部传记。丛书得到了湖北省科协与湖北省科技馆的鼎力支持，还有广大读者的响应。我们期盼社会各界继续支持这套丛书，使丛书发挥更好的作用。

丛书编者
2018 年 6 月 20 日

目 录



第一章 初出茅庐	/1
第一节 少年李济	/2
第二节 初入清华园	/7
第三节 留学美国	/12
第四节 三次改专业	/16
第五节 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	/21
第二章 从南开任教到重返清华园	/33
第一节 南开任教	/34
第二节 新郑考古与初识毕士博	/37
第三节 西安讲学	/39
第四节 重返清华	/42
第五节 四位导师还是五位导师	/48
第六节 晋南调查与西阴村遗址的发掘	/52
第三章 加盟史语所与殷墟发掘	/63
第一节 与史语所结缘	/64
第二节 第一次殷墟发掘	/68

第三节 第二至三次殷墟发掘	/75
第四节 城子崖遗址的发掘	/83
第五节 第四次殷墟发掘	/88
第六节 第五至九次殷墟发掘	/92
第七节 第十至十二次殷墟发掘	/103
第八节 第十三至十五次殷墟发掘	/108
第四章 战火纷飞中的李济	/117
第一节 七七事变后的艰难转移	/118
第二节 短暂栖息昆明	/122
第五章 世外桃源李庄	/129
第一节 初到李庄	/130
第二节 长女的离世	/133
第三节 王建墓的发现	/136
第四节 第一次西北考察	/138
第五节 李庄最后的日子	/143
第六章 战后的李济	/155
第一节 日本之行	/156
第二节 离开大陆	/163
第七章 辉煌的后半生	/171
第一节 从杨梅到定居南港	/172
第二节 李济主持下的史语所	/175
第三节 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178
第四节 殷墟研究	/186
第八章 家庭生活	/189
第一节 相濡以沫的陪伴	/190
第二节 与儿子天各一方	/191
第三节 继承衣钵的继子李光周	/193

第四节 不朽的一生	/195
附录 李济先生学术活动和著述编年	/198
参考文献	/211
后记	/213

第一章 初出茅庐



第一节 少年李济

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 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灾难，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中国即将陷入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机。康有为 1895 年在《强学会序》中写道：“俄北瞰，英西啖，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辽、台茫茫，回变扰扰，人心皇皇，事势僥僥，不可终日。”

1896 年 6 月 2 日这一天，李鸿章特使奉命秘密前往俄国，清政府在经受鸦片战争、甲午海战之后，试图想用西方先进技术来改变中国的悲惨命运，改变之前“以夷制夷”的外交战略，一份丧权辱国的《中俄密约》将在第二天正式签订。密约内容讲的是清政府同意俄国人修筑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的西伯利亚铁路，用这些条件来换取与俄国的结盟。李鸿章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他担心会不会又陷入沙俄的圈套中……

就在李鸿章出使俄国的当天，坐落在湖北省钟祥县中果园街双眼井的这个地方，当时为郢中镇，其中的一户读书人家，在这一天降生了一个男婴，取名“李顺井”，他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李济。

同一年的 3 月 26 日，与李济命运息息相关的傅斯年出生在山东聊城北门里。

李济的父亲名叫李权，因家居郢中镇，故号“郢客”，是一个知识分子，安分守己，虽然饱读诗书，但却只想过着平淡日子。

据李济之子李光谟回忆：

李家在湖北之前是从江西过来的，二世祖就迁来钟祥，好几百年了。家里有本油印的家谱。老家的情况我知道得很少，手里资料也很缺。爷爷编修过《钟祥县志》，30 年代出版过，现北京图书馆有存。钟

祥的祖屋早已破败，在郢中镇，原与县城有一点距离。爷爷填词称“郢客”即出自于此。现郢中镇已并入县城，是县级钟祥市的一个小地名。老屋是祖父什么时候买下的，我不清楚。原是五进屋，现只剩一进了。先是1939年被日本飞机炸掉了一两间，1949年后又给别人挤占了一部分。现在那房子由我远房的堂弟住着，他祖父与我祖父是同一个曾爷爷或高爷爷，隔了好几房人。

父亲李权与母亲涂氏结婚时，都才十六岁。年轻的李权饱读诗书，通晓大义，开设学馆，招收学徒，靠教书来维持家中的生计。十三年后李济才出生，对于儿子的到来，夫妻俩对其抱以深厚的希望。

李济在《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中的回忆，对自己的父亲充满了敬意。他说：

我的父亲原本就是一个苦读成名的孤儿。祖父逝世时，他年方一岁半，另有一位半岁的叔父伴着他。祖母靠着家中的几亩薄田，把他们兄弟两位抚养成人。父亲小时候读书的成绩很好，因此得到若干近亲的帮助，上进得很快。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开始教家馆，用来贴补家用。等到入学后，又很快地，他就成为本县教“大馆”的先生了，替成年的童生看文章。

父亲自己的功名，在早期是靠着作八股文章；但光绪末年科举的考试科目，策论已是并重的了。他对于程朱孔孟的思想所作的研究工夫，是很大的。他在壮年，精力显然有过人的地方，所以除了学会争取功名的这套工具外，他很早就有志于文学。他信“文以载道”的说法，认为作文章是读书人的一件终身大事；对于唐宋八大家和桐城、阳湖诸派的古文之摹仿，是他自定的很严格遵守的进修课程。到了晚年，弄笔墨成了他唯一的消遣。偶尔他也作些诗词。但他终身最感兴趣的却是在教育子弟。

对于自己的母亲，李济曾在《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中也有

提到：

我的母亲，在晚年追述她结婚后的工作，把每日的盥洗和打扫房屋列为第一紧要的事，母亲是一位爱洁成癖的人。在童年时，我们兄妹所受到的她的训诲，大半都是与这一习惯有关的格言。她常告诫我们说：“穿衣服，破的补的，不丑；穿不干净的，才丢人。”母亲有一位妹子，家里穷得常常地断炊；但我的这位姨妈所穿的破旧衣裳，总是干干净净的。

李权虽然学识渊博，又在全县最大的一个学馆里教书，但他却不直接教导自己的儿子。也许是遵循孟夫子“易子而教”的古训，他把自己四岁的儿子送进表弟的书房发蒙。在孩童时期的小顺井印象中，只记得表叔是一个沉默寡言的老秀才，特别喜欢打闷棍，用来敲打和鞭策学生。幼时的李济，也记不清楚自己从表叔那里学到些什么，受到过哪些教益，但挨过闷棍的事儿却记得很清楚。

在发蒙时期，父亲虽然没有亲自教导自己的儿子，但是在教学内容安排方面，却对幼时的李顺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李权认为小孩子刚开始念书的时候，要挑选一些比较难的书给他念，然后再让孩子读相对容易的书，这样的话，感觉孩子的进步就会快一些。因此，在小顺井发蒙时期，不是先学易懂的《三字经》，如“人之初，性本善”，而是先读较难的《幼学琼林》，如“盘古首出，天地初分”。小顺井继而读《四书》，也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念完之后，继续读的不是文采斐然的《诗经》，而是更为枯燥难懂的《周礼》。李权虽然用心良苦，而李顺井却并没有觉得自己进步很快，感觉自己的进步不过和平常人的速度一样罢了。

九岁的李顺井在还未读完《周礼》的时候，就被父亲送进县里的高等小学堂，作为一名插班生开始接受新式的教育。李济曾在《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中写道：

初尝到新教育的滋味，渐渐觉得念书并不是很苦的事。

回忆往事，李济还说道：

读《周礼》的课程是没读完，至于这一课程对我幼年教育的影响却是多方面的，……我到了九岁的时候，尚不能提笔写一封简单的家信。上了新学，便有机会学“格致”、“体操”、“东文”这些新玩意儿。

十岁的时候，李济考进了当地县立的高等小学堂，逐渐喜欢上了念书，觉得读书也并没有那么的枯燥无趣。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李权被钟祥地方教官选为优贡，让他作为钟祥代表，去京城参加会考。李权前往北京，参加了会考，获得了一个七品文官。在当时清朝七品文官大多都是翰林院编修、各部院七品笔贴式等。

李权本来可以到福建当一个知县，但他推掉了到京外做官的机会，选择留在皇宫内务府听任。于是李权计划着将全家搬迁至北京。李权在北京安顿好后，就把自己的夫人涂氏、儿子李济、小女李葆华以及一位堂侄从湖北接到北京。当时处于懵懂时期的李济就这样随着家人来到了北京。由于路途遥远，一家老小在途中颠簸了三天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李济家住在厂甸附近的达子营16号，这个地方距皇宫不远。

父亲的这次升迁，改变了全家的命运，同时也对李济之后的学习生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李济也曾说假若没有这次的搬迁，也许他的人生就是一个在纸上“格物致知”的旧式读书人。李济在《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中写道：

与我童年所交的朋友相比，我只记得我并不算什么特别聪明的小孩子；但是我的这些幼年朋友们，大半都像洪涛中的沙砾一样，沉淀到海底去了。我却是幸运地被包工运送到建筑场所，构成了三和混凝土的一份子，附属在一个大建筑的小角落上。

1908年，父亲将李济送到一个由湖北人办立的江汉学堂读书，和李济在之前老家中读书的环境差不多，但也有所不同。初来乍到的李济渐渐地融入到新的环境中去，适应新环境。半年之后，李济成功考进了当时最好的中学——南城琉璃厂厂甸的五城中学。那是中国第一所公立的中学，它的前身叫五城学堂，是

在1902年才更名为五城中学堂的，这也是我国有“中学”这个概念的开端。李济所在的班级中，教授他国文课的老师是我国大名鼎鼎的文学家、翻译家林纾，这位国学老师是一位非常有趣的旧派人物，他的学生关懋德曾在文章中描写道：

国文教师有林纾，字琴南，别号畏庐，“新文化运动”的死对头，自称是“七十老翁”。每星期好像是两小时，专讲解《史记》，闽侯口音极重，凝神谛听，听懂了非常有趣。因为林老翁学过拳脚“功夫”，讲到兴致淋漓的时候还露一露身手，表演“图穷而匕首见”，荆轲如何行刺秦王不中的情形。他讲国文大概也会讲一些中国之外的事情，比如他翻译的《茶花女》之类的新鲜事。

在课余的时间，李济跟从父亲继续学习《孟子》，奠定了扎实的国学基础。晚年的李济回忆父亲时说：

父亲的这一类讲解，继续了大约两年。但这一期的课外补习，留在我心中最深的，是他所讲的“予岂好辩哉”、“君之视臣如手足”、“牛山之木尝美矣”、“鱼我所欲也”、“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尤其是《公孙丑章》所讲的“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些章。最后的一章，似乎是父亲生平最感兴奋、最乐于为生徒发挥的孟子之道；他讲时的神情，能使童年的子弟听时鼻孔里不敢出气。这是六十年前的事了。六十年来，我总能极清楚地回想到父亲在他中年讲《孟子》时候的清脆声音和那光辉的容貌。

父亲津津乐道的“性善论”，李济在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同时对此也产生了疑问，如以羊易牛的不忍人之心，不如佛教不杀生更为彻底，而自己的反驳也遭到了父亲的训斥。李济在经过新式教育的熏陶后，自身知识不断丰富，对孟子思想产生怀疑，信仰在渐渐地发生改变和动摇。

第二节 初入清华园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列强的侵犯,一些名人志士都想要通过变法来改变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戊戌变法的实行,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也迫使晚清政府实行了一些新政,在教育方面的一项举措就是派遣留学生到海外留学。刚开始的时候倾向于派遣留学生到日本留学,在1896年至1906年这十年之间,留学日本的学生已达到近万人,后来日本方面以中国留学生喜欢滋事为借口对中国留学生数量进行严格的限制,留学日本的学生逐渐减少。

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中国作为战败国,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再一次割地赔款,这次条约中的赔款又称“庚子赔款”。1907年,为了吸引中国选派留学生到美留学,美国方面决定退还多收的庚子赔款,本金利息总计有二千九百万美元。正是以这笔“庚款”为基础,才诞生了清华学堂。

清华园原是清朝皇家的避暑胜地。据说乾隆帝驾临工字厅,看见山林变幻,绿水环绕,树木葱茏,让他不禁想起晋朝诗人谢琨的诗:“韩裳顺兰芷,水木湛清华。”于是,乾隆帝就给这个地方题写了“水木清华”四个字。这之后,咸丰皇帝直接将该地命名为“清华园”。

在1909年的夏天,清政府外交部在清华园的工字厅里设置“游学肄业馆”。先后派出了两批由庚款支持的留美学生。1911年,“游学肄业馆”正式改名为“清华留美预备学堂”。清华学堂在刚开始创办的时候,在北京的招生指标是一百二十人,而报考清华学堂的人数就多达一千多人。十五岁的李顺井参加了考试,被录取进了“备取榜”,排名在倒数第三,有幸进入了清华学堂,开始新的学习生活。

1911年4月29日,带有德国古典风格的清华学堂,在工字厅的东侧建成,学堂里不断地传来阵阵略带蹩脚的洋腔洋调,李济也是这些童声中的一员。开始了他在清华园中为期七年半的青春岁月。清华园的新生活点燃了他的新希

望，“李顺井”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济”，字“受之”。刚到北京时父亲对李济的学习还有很大的影响，但在进入清华园以后，父亲对自己的影响越来越小，虽然父亲也接受新的思想，但仍改变不了守旧的思想根源。

不巧的是，刚进校园不久的李济就赶上了当时社会上的一场大变动——辛亥革命。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学校在此期间曾经中断过一段时间，之后又接着办了下去。1911年清华学堂成立之后，根据之前的惯例，每年都会选派一些学生到美国去留学深造。在清华学堂逐渐走向正规的同时，也扩大了留学生的范围。从1912年开始，陆续有毕业生到美国继续留学深造，而留学生不仅仅局限于幼童。直到1929年改制成大学以后，清华才最终完成了它的“留美预备学校”的使命。

1911年12月25日，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之下，隆裕太后宣布溥仪皇帝退位。这一天的到来，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终结，悠扬的音乐飘遍整个清华园。

在当时，清华园的学生并不多，教师也很少，在管理学生方面，完全按照美国专科学校式的方法进行管理。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罗素曾到这里参观，发出“恰似一个从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的感叹。

清华的学生进校就是从中等科开始读起的，学校的功课安排也大多是以英文为中心，要求学生可以熟练地“听说读写”，甚至连图画、音乐、体育课也由外国教师上课。李济在清华经历了中等科三年半、高等科四年学习生涯，大体上完成了相当于我们现在学生初中到大学二年级的课程。李济在回忆起这一段的学习时，他自己也感到在清华园的这段学习时光中，学到知识技术性的比较多一些，而涉及价值观念的比较少。经过磨砺的李济当时就想学点“洋东西”来对国家社会做点有价值的贡献，因而最要紧的就是要把英文学好。

以培养留美学生为重心的清华学堂，从学校建立起就不太重视“国文”，因此多把国文课程安排在下午来上。李济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对国文始终保持着浓厚兴趣。虽然在当时的清华，国文课大多学生不太喜欢，学生的学习热情不高，但是李济在此期间却遇到了让他受益终身的两位国文导师。第一位国文导

师是马季立先生，马先生精通八股之道，马先生给李济这些学生上课时说：他曾教过梁启超，非常赏识梁启超的作文，说梁下笔特别快，别人作八股的时候，而梁可以作十六股。在民国初年，梁启超已经是中国社会上的第一大名士，他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中所写的文章，在当时轰动全国，使他声名大噪，名扬四海。马先生善于发现和鼓励学生，有个姓谢的广东同学文章写得好，他说这个同学的文章应该打一百二十分，打一百分不足以奖励。因此李济等同学对马先生十分敬佩。经过马先生的八股文式训练，李济的写作能力不断提高。

在高等科一年级的时候，李济遇到了他人生中又一位对自己国文产生重大影响的导师饶麓樵。饶老师上课不同于之前的国文老师，有其自己上课的独特之处。他在上课时候，很少开口讲话，喜欢板书，等到板书写完，也就差不多快要下课了。饶先生对李济的读书札记特别欣赏，在批语中曾出现过“所见可与《困学记闻》相比拟”的话，这样的夸奖令李济受宠若惊，因为《困学记闻》是宋代大学者王应麟的读书笔记。不仅如此，饶先生对李济的作文所作的批注和评语也是很有启发性的。他在清华五年级时写的七篇读史作业依然保存到现在，有的不过千字，有的二三百字。饶先生对作业都进行了认真批阅，改错字，删赘句，注意修辞，匡正史实。对学生的优点更多地给予鼓励，如对各篇的评语：“分别条流，饶有史识”，“行文疏疏落落，饶有林下风致”，“行文极操纵顿挫之致，是真读过太史公书者”，“贯串驰骋，雅见匠心”，可见这位老师对学生多么地关心和爱护！

李济跟从饶先生读《荀子》的时候，对荀子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李济认为荀子《天论》中“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思想，很是合乎自然科学的发端；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又很合乎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然而，如果再进一步追问，这些两千年前就绘制的社会蓝图，至今仍难以实现，到底是先贤的思想不彻底，还是民主与科学这东西本不符合中国国情？李济对孟、荀两大圣贤的思想也产生了怀疑，这就激发了李济向国外求学的欲望，使他想到，也许只有到中国之外的地方，才能寻到“救国良方”，因此他一心想要到海外去寻求新出路。

清华采取封闭式的管理模式，重视学生的素质教育，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动